

《金錢與戰爭——抗戰時期的貨幣》。戴建兵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年。342 頁。

戴建兵先生研究中國近現代貨幣史用功甚勤。至目前為止，戴先生已經出版了三本中國近代貨幣史的相關著作，分別是 1993 年的《中國近代紙幣》、1995 年的《金錢與戰爭——抗戰時期的貨幣》以及 1996 年的《中國近代商業銀行紙幣史》。其中，《中國近代紙幣》和《中國近代商業銀行紙幣史》這兩本書，側重於整理近代貨幣史料及介紹發行史實；而《金錢與戰爭——抗戰時期的貨幣》（以下簡稱本書）則在史實敘述外再加上作者的史論分析，較另外二部作品更具有學術性。同時，本書也是大陸學界近年來首見以抗戰時期貨幣史為研究場域的專著，故可視為代表彼岸在此學術課題上的具體成果。

本書雖名為《抗戰時期的貨幣》，然其論述時限涵蓋清末至 1949 年，亦可視之為中國近現代貨幣發展史。作者在本書前二章概述咸豐朝至抗戰前夕中國貨幣的發展歷程，以中國實施法幣改革與日本深具野心的在華貨幣發行活動為討論重心；第三章至第八章為本書核心，全面考察抗戰時期中日各方政權貨幣的發行與競爭經過，並對於中共各根據地貨幣的成長多所著墨；第九章則簡要敘述戰後接收各日偽政權貨幣的經過。

第一章「破碎的方圓」，作者指稱中國近代貨幣具有「封建性與殖民地性」，「封建性」指中國各式銀兩、銅元和紙鈔私票橫流，使幣制無法統一，破壞經濟基礎，民眾飽受通貨貶值之苦，甚至一生積蓄化為烏有。「殖民地性」指列國在華濫發各式銀元和紙鈔，投機稍有不力就宣布破產。為了能夠順利銜接本書主角的日偽政權貨幣，作者舉出日系的橫濱正金銀行、朝鮮銀行和台灣銀行，在中國東北和台灣的發行概況，說明日本在發動侵華戰爭前，已經不斷侵削中國貨幣權的歷程。接著，作者敘述國民政府實施「廢兩改元」，採行銀本位制度和建立金融體系的簡要經過。然而，此時中國的貨幣制度仍

未統一，銀本位制度亦無法應付各國的經濟侵略，這二項事業須待法幣改革才得以完成。

第二章「法幣改革」，敘述法幣改革前後的國際經濟與外交情勢。1930年代世界經濟蕭條，各國力圖鞏固本國經濟，控制弱國貨幣以掌握弱國經濟，增強本國貨幣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達到轉嫁危機的目標。當時爭奪中國貨幣權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英國、美國和日本。國府面對列強的壓力，於1935年11月3日宣佈實施法幣制度，對內發行不兌現紙幣，對外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穩定匯價，正式脫離銀本位。作者認為，法幣改革反映了中國抒解國內經濟困境的努力，它統一近代混亂的幣制，改善銀行制度，並在發行時貶值十分之四以促進出口業績成長，達到復興產業及解除經濟國難之功；同時，它也是國際帝國主義力圖控制中國貨幣的鬥爭，中國選擇與英美二國保持穩定匯價，使英美二國在中國利用貨幣直接影響中國經濟，因此它其實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經濟發展的幣制」。

第三章「日元的侵略史」，說明日本自九一八事變至抗戰結束期間，在各淪陷區「扶植傀儡銀行、發行偽幣，使偽幣與日元直接掛鉤，等價行使，組建日元集團，為日本對中國的軍事和經濟侵略服務」的經過。日本在中國占領區劃分為數個獨立貨幣圈，包括東北的滿洲中央銀行、華北的聯合準備銀行、華中和華南的中央儲備銀行和軍用票，彼此有通匯制度和匯率，達到分而治之的控制效果。淪陷區各項偽幣都是日元的附屬物，它們在剛開始出現時名義上與日元等值發行，以便日本進行原料掠奪和商品傾銷，但在戰爭擴大後，為避免日本國內的經濟負擔，偽幣又與日元脫鉤，完全聽命於日本在華掠奪物資的指示。

第四章「築起我們錢的長城」，敘述國府在國統區完成貨幣統一發行，成立四聯總處指導戰時金融業務，建立戰時金融網的努力。在法幣和偽幣流通的中介區間，則由地方銀行發行省鈔，鞏固後方金融，阻擊敵偽政權利用法幣套取外匯，從經濟面支撐抗戰事業。中共各根據地也發行自己的貨幣，與法幣和省鈔共同成為對抗日偽貨幣戰的主體，並且也使「根據地的經濟建設爭取巨大的成績」。

第五章「夫戰，廟算多者勝」，分別敘述戰時日本和國共政權三方對於

貨幣鬥爭的策略。日本的策略有：(1)對中國分而治之，各區有獨立的銀行，製造經濟的獨立圈，以便控制。(2)日偽政權銀行的貨幣均與日元等價行使，把所有偽幣納入日元集團的一員，加強控制淪陷區的貨幣和經濟。為建立集團通貨的信用，日本必須向中國輸出物資，並從中國以較高價值購買輸入品，這對經濟實力並不十分強大的日本形成負擔，於是日本在華中被迫改變策略，汪政權的中央儲備銀行不納入日元集團。日本的貨幣戰策略在初期以套取中國外匯，向英美各國換取戰略物資為主，後期則利用從偽政權收兌的法幣搶購非淪陷區物資，以偽幣直接掠奪中國物資。其次，國民政府的貨幣戰策略為：(1)透過穩定外匯和實施金融管制措施來維持法幣幣值。(2)禁用偽政權貨幣，維持法幣在淪陷區內的流通。(3)1941年7月26日，英美封存中日資金後，國府改變貨幣戰策略，在大後方發行關金券來阻止物價上漲，並向淪陷區和中共根據地拋出法幣以搶購物資。(4)國府為支付戰費和維持財政，不得不增發法幣，造成通貨膨脹，故當局以爭取英美等國的外援和借款補充法幣的準備金作為解決之道。最後，中共政權的貨幣政策為：(1)以物資、偽幣和法幣為準備發行貨幣，目的在發展經濟。(2)在新四軍事變之前，中共採取支持和保護法幣政策，之後則貶值收回向外拋出以換回貨物補充抗戰實力，妥善處理根據地貨幣與法幣之間的關係。

第六章「中日貨幣戰」，內容包括貨幣流通區域的陣地戰、外匯戰、金銀爭奪戰、真假鈔票戰和物資戰五大類型。作者認為，在陣地戰方面，國府由於軍事失敗，淪陷區日漸擴大，法幣處於退卻態勢，中共政權則迎擊敵偽貨幣，奪回被日軍侵入的貨幣地盤。外匯戰方面，國府以維持外匯比價來維持法幣的幣值，外匯存底損失慘重，為英美利益而犧牲，成為外交及政治結盟的籌碼。此時中共貨幣陣地擴大，阻遏敵偽對法幣的吸收，從而保護了法幣的外匯。金銀爭奪戰方面，日本大量掠奪中國金銀，國府的應付之道先是收購黃金，後在1943年6月起開放自由買賣，出售黃金以回收法幣和控制物價，反而被套取大量黃金，使國統區金價與物價一起上漲。在真假鈔票戰方面，主要活動是日軍偽造法幣和中共貨幣以吸收物資。物資爭奪戰方面，日軍以偽政權鈔票、軍用票和法幣吸收物資，同時把大量法幣趕出淪陷區，達

到破壞中國戰時幣制的目的。中共在 1942 年後加強貨幣障地，禁止法幣流通，防止日偽利用法幣搶購其物資。並在日偽地區物價提高時，以壓低偽幣比價的方式來吸收重要物資，待日偽地區物價下跌時利用手中的偽幣到敵區搶購物資，取得利用物資的貨幣戰勝利。

第七章「敵乎？友乎？」，討論國府的法幣與中共政權貨幣的關係。國府認為中共發行貨幣是擾亂金融，採取限制發行和禁止使用的作法，同時查封銀行和印刷物資。中共貨幣開始發行時是以法幣為基礎，以法幣輔幣的面貌出現，起了維持法幣固有障地保護中國抗戰實力的作用。日後不讓大批贬值的法幣湧入根據地，也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作法，無可厚非。最後，中共貨幣脫離國統區法幣強有力的影響，使其根據地金融和物價得以在自主的支配下順利運轉。

第八章「錢能通神」，討論貨幣與政治的相互關係、和戰爭支配下的貨幣經濟與通貨膨脹發展現象。抗戰初期，英國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將中國海關交給日本，犧牲中國利益以保有其在華利益。直到 1939 年 2 月 15 日，日本公布日元集團國家發展計劃，預示英國將根本喪失在華利益，加上美國對日本態度強硬，英國才提供五百萬英鎊的外匯平準基金，貨幣成為國際關係的媒介。同時，貨幣也是國內政權與人民經濟關係的媒介，戰時各方政權均極力維持其通貨幣值，以贏得人民對其政權的信任。國府的法幣是國際化的貨幣，它一方面須支持戰時軍政開銷和發展大後方經濟，一方面以維持淪陷區法幣價值來還擊日偽政權貨幣的挑戰，顯得左支右絀，最終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促成大後方投機事業惡性發展，對人民生活造成巨大損害。在淪陷區，日偽政權以通貨膨脹來掠奪人民，榨取軍用物資。中共治區則因多為自然經濟區，雖也有通貨膨脹現象，但由於能掌握物資，使人民生活受貨幣贬值的影響遠低於城市地區，故儘管貨幣購買力較為下降，人民卻因家有存糧而生活安定。

第九章「明日黃花」，作者簡要敘述國府在戰後對於各日偽政權貨幣的整理經過，並且提出評論：抗戰時期的貨幣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國民政府雖經歷戰時通貨膨脹，卻沒有認識通貨膨脹對社會經濟的危害，於是在國共內戰期間依舊倚賴印鈔機來維持財政和供給軍需，引發了國統區

經濟的崩潰和人民的反抗。國府在戰後未能利用接收日偽財產和大量美援的良好時機，坐失整理法幣的機會，內戰加重法幣的負擔，導致其走向崩潰的命運。

作者根據充分的史料，敘述抗戰時期各方政權貨幣的發行情況，並對其間發展歷程提出較中肯的論斷，使得過去大陸學界論著充滿特定意識型態的現象，在本書中已經明顯改善。例如，本書對於國民政府在實施法幣改革時堅持本國權益，拒絕英國提議承認滿洲國為代價來協助中國進行幣制改革，肯定國府拿出自己的幣制改革方案，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的描述，一改過去大陸論著提到國府面對強權要求時均以懦弱屈服一語帶過的習見。又如，本書對於抗戰期間日本在華發行貨幣的政策變化有相當細密的討論，指出日本在戰爭初期不惜傾其國力，支持日偽政權貨幣和軍票的幣值，建立大東亞地區的日圓集團和貿易圈。日偽政權貨幣和軍票固然都是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掠奪，然而在刺刀之下，都還是必須有金銀資產或日本輸入物產作為後盾，才能順利行使，並非「不值一文的廢紙」，由此可見，大陸學者在戰後五十年的今天，已能心平氣和運用史料去從事學術研究，重建歷史的實景。

不過，大陸學界的解釋框架，在本書中仍是不絕如縷，削弱了本書應有的學術價值。例如，在第一章帝國主義發行貨幣的「殖民地性」部份，作者就絕口不提為何人民願意使用外資系統銀行紙幣的原因，例如英系的匯豐銀行因為管理中國的關稅、鹽稅，投資工礦實業，也辦理票據清算業務，民眾因銀行獲利良好，幣值穩定而樂於使用其貨幣，這豈是「剝削」二字就能解釋？同時，在作者的刻意安排之下，本書以日系貨幣作為帝國主義在華侵略的代表，不討論其他外國銀行在華發行的情況，如此一來會讓讀者誤以為抗戰前夕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外國銀行系統是日本銀行，然以 1936 年各主要外資銀行的發行額折合中國銀元的資料看來，英系的匯豐、麥加利和有利銀行發行 102,486,290 元，美系的花旗和美豐銀行發行 100,237,290 元，法系的東方匯理銀行發行 160,237,090 元，英美法三國外資系統的銀行貨幣發行額均超過日系的正金、朝鮮和台灣銀行的 98,038,982 元。這種割裂史實來適應論述脈絡的作法，為嚴謹史家所不取。

在第二章法幣改革中，作者在肯定國民政府以法幣改革抒解經濟困境的努力和統一近代混亂幣制的成果之餘，也不忘批評它使英美帝國主義得以進行經濟侵略和政治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本章的討論內容，無論史料或分析二方面均未超越台灣學者卓遵宏的《中國近代幣制改革史(1887-1937)》和劉文賓的《國民政府的法幣政策及其實施(1935-1948)》兩部作品。對大陸學界這種想當然爾的習見，劉文賓即提出質疑：「法幣政策深受英美勢力的牽制是事實，然而，不與任何外幣連繫是否就表示獨立自主？與外幣連繫是否就意味帝國主義者政治經濟侵略的更深刻化？事實上，中國過去在銀本位時代未與外幣連繫，卻因為無法掌握世界銀價的波動，結果受害無窮，毫無自主性可言；而日本日圓與英鎊也保持密切的聯繫，卻沒有喪失貨幣自主權的顧慮。因此，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處於次殖民地的經濟地位，而不在於貨幣是否與外幣連繫。」如果大陸學界堅持本國貨幣若與外幣聯繫即代表殖民地性，那麼當 1997 年 7 月中共收回香港之後，港幣至今仍採盯住美元的策略，香港是否就是美國進行經濟侵略和控制的殖民地呢？大陸學界或許應從貨幣制度在運作時必須配合國際經濟環境的角度，來重新解讀中國近代貨幣發展史。

作者在討論抗戰時期偽政權的貨幣，一概論定為傀儡與奴才，但是歷史事實並不是那麼簡單。以汪政權的中央儲備銀行為例，作者在書中譏之為「苦苦哀求後才得設立的奴才銀行」，其業務「總得聽主子的吩咐，維持主子的利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曾在 1942 年 1 月向汪政權提出逐步停發軍票，利用中儲券支付其在華軍費的方案，當時周佛海立即表示反對，日方於是以汪政權可以收回淪陷區的統制物資權力作為交換條件，雙方才達成協議。從這項史實看來，日本利用偽政權時，也必須取得其合作，才能順利推展經濟徵發業務。因此，偽政權在考量淪陷區利益的前提之下，實能擁有一些自主的空間。

再以備受作者讚譽的中共政權貨幣方面來觀察，作者顯然受到太多的愛國情操左右，以致於無法面對真實的歷史。作者在第四章裏把華北八路軍開關的四大根據地貨幣稱之為「偽聯銀券的剋星」，認為它們抗擊了王克敏政權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貨幣侵略，而新四軍在華中的八個抗日戰略區貨

幣，也在對日偽政權貨幣鬥爭有良好成績。如果作者曾經細讀最近十年在大陸各地出版的各中共邊區或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史料，便不應作出如此輕率的論斷。抗戰時期中共在華北建立的各個邊區，由於必須從淪陷區獲得給養，聯銀券是他們不得不使用的交易媒介，使得聯銀券長期擁有貨幣流通的優勢。例如在晉察冀邊區，因為時常遭受日本軍事掃蕩而使邊幣市場逐漸縮小，加上邊區對淪陷區的貿易需求，聯銀券一直在邊區內擁有流通數額和兌換比價的優勢，甚至到 1944 年 11 月份時，邊區市場上物資交流也都還是按聯銀券計價，一般群眾和部分中共幹部也願意使用聯銀券，邊幣數量很少，這種情形一直要等到 1945 年 8 月日軍戰敗才改變。上述歷程，在魏宏運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史稿》第九十四頁中有詳細說明，作者在參考文獻中也列了這本書，不知道為何沒有採用魏先生的論述？又如在晉冀魯豫邊區，因為對淪陷區嚴重入超，群眾拋出冀南銀行幣兌換聯銀券俾以進行貿易，使冀南幣的幣值大跌，如何能夠抗擊聯銀券的侵略？而在晉綏邊區，從 1941 年到 1944 年間的主要貨幣都是銀洋，中共的西北農民銀行幣要到 1943 年才因鴉片特貨貿易而穩定幣值，至 1945 年逐漸擴展流通範圍。至於中共在華中和華南地區的抗幣，則均須依附在法幣的實力下，以法幣的輔幣姿態出現，才能與日本的軍票和中儲券競爭，其流通區域狹窄，在戰時貨幣市場上居於次要地位。因此，抗幣在貨幣戰中的地位，與其說是打擊日偽政權貨幣，不如說是建立中共的金融地盤，進而鞏固其軍政勢力範圍。

作者討論戰時國民政府進行對日偽政權貨幣戰的成果得失時，認為由於大後方出現嚴重的物價上漲，造成民眾生活困難，因此對於中共治區排斥法幣，並實施大生產運動以壓低物價上漲的成果頗為得意，認為這才是保障百姓生計的良好典範。持平而論，戰時法幣的貶值，動力固然來自軍政費用激增，不得不增發貨幣支應，而另一重要因素則是法幣的流通地盤日蹙，淪陷區日偽政權不斷禁用法幣以推廣其通貨區域，並將收兌的法幣拋向大後方，日益增多的貨幣在業已縮小的區域裏流通，幣值焉有不跌之理。中共治區在新四軍事變後排斥法幣，讓法幣的貶值現象更是雪上加霜。國共兩黨長期兵戎相見的心結，在戰後「共赴國難」的號召下也未能化解，當戰時各地的地

方銀行發行省鈔輔幣時，中共治區也想比照辦理籌措財源，自然不為國府所容。中共也不管國府是否同意，自行印製發行各式邊幣和流通券。中共政權在發行貨幣之初，即以自主為指導原則，認為邊幣和國府法幣之間有「既聯合又鬥爭」的關係，例如陝甘寧邊區在發行光華商店輔幣代價券時，因為國府不同意其發行面額在一元以上的主幣券，中共即發行票面為七角五分的光華券，代替法幣的主幣券使用，達到既維護統一戰線，又解決財政困難的功能。戰時各省銀行發行貨幣，均與法幣搭配行使，並未出現中共治區驅逐法幣的活動，難怪國府要把中共貨幣視為「法幣的新敵人」，因其發行非但不去保護法幣，反而打擊法幣的幣信，其目的在於建立中共治區的金融基礎。簡言之，中共戰時貨幣戰的主要目標是透過建立金融據點和貨幣體系，鞏固其政軍勢力範圍。這些歷史事實，在戰時文件中隨處觸目可見，當時中共各地的領導人也從不諱言。作者不必再標榜戰時中共貨幣「面對日偽的瘋狂進攻和國民政府的經濟封鎖，為了民族利益作出了許多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之類的套話。畢竟，在戰爭時期，唯有生存和壯大才是政權真實的保障。

在本書的終章中，作者斷定抗戰勝利後國府並未從事建設，也未認識通貨膨脹對社會經濟的危害，挑起內戰加速法幣崩潰，這又是大陸學界想當然的習見。作者指責國府決意徹底消滅共產黨而挑起內戰，與本地的中共蓄意叛亂說相對，各有其政治立場。其實，國共雙方長期互不相容，必有一戰，吾人暫且不去深究內戰的責任歸屬問題。問題是，內戰的確促成了法幣制度和國統區經濟的崩潰，身為交戰者的中共政權能夠撇清責任，只單獨指責國府舉措失當嗎？抗戰時期日偽政權與國府軍政相抗，造成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壓力的類似場景，在戰後又重新上演。一如日偽政權必須承擔破壞戰時中國經濟的責任，中共取得統治政權的歷程，也帶動著中國經濟的大變局，促成法幣的崩潰命運。

就研究的主體看來，作者敘述各方政權發行貨幣的過程，均以發行額的成長情形作為主要內容，這種討論方式的前提是必須假定各政權可以將其貨幣發放到其治區行使，人民完全會接受其統治者的貨幣，也就是說，此模式是適用於單一貨幣流通區域。然而，在抗戰時期，中國各政權轄區幾乎都不是單一貨幣流通區域，尤其在政權交界處，常見多種政權貨幣同時流通的情



形。因此，各政權貨幣在實際流通時會產生代表良幣或劣幣的相對購買力差距，而其具體的表現即是在各貨幣之間出現互相兌換的比價變動。國府的法幣與日偽政權的貨幣如日圓、軍票、聯銀券、華興券和中儲券之間有長期的比價變動資料，中共貨幣與日偽政權貨幣之間、國府法幣與中共貨幣之間也都有比價變動資料，學者可以從三方政權的貨幣比價變動情形，找出戰時貨幣強弱消長的趨勢，觀察貨幣戰的成果。有關戰時貨幣戰的比價問題，作者並未加以處理，而這正是筆者在拙著《抗戰時期的貨幣戰爭》的討論主題。筆者與戴先生大約是在同一段時間研究相同的主题，拙著完成於 1995 年 6 月，較本書早半年問世，然而由於資訊溝通不易，彼此均不知道海峽對岸相關課題的研究情形，也無從交流，本次的經驗或可提供日後兩岸學界加強交流的參考。

在史料運用技術方面，本書也有一些待再修潤的地方。例如，作者在註釋中記載其引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資料時，只有「三(2)3010」之類的幾個編號，讀者除非親自到南京查訪，否則無從瞭解作者運用原始檔案的情況，這是大陸論著中常有的現象。在這方面，台灣學者則多會鉅細靡遺地列出檔案典藏地、史料編號、原行政機關和史料名稱等等資訊，為有興趣再作深入研究者提供指引。列出詳細史料資訊，對作者來說應該不會是一種負擔，而且這種作法表示其言必有徵，可提升其著作的嚴謹性。

其次，若分析的問題是在學界具有多方說法者，也宜一併提出，並且說明作者在取捨史料時的考慮，再作出結論。例如，作者在討論戰後對淪陷區貨幣的處理時，引用中國國民黨文工會 1984 年出版的《中國國民黨與經濟建設》一書的說法，以上海和重慶的物價購買力為準，認為中儲券和法幣的兌換比價應訂為四十八比一，國府當時訂的二百比一顯然高估法幣的實力。同樣的以物價購買力為判準，也有五十六比一的說法，不知作者為何不採取？當時主事者也曾留下合理比價說法的記錄，如擔任汪政權財政部長的周佛海是以中儲行當時庫存的黃金、白銀、美鈔和日圓價值為準，認為合理比價應為七十八比一；曾任中央儲備銀行副總裁的錢大樞，則以中儲行庫存的黃金、白銀及外匯的發行準備額與其發行額為準，提出二十八比一的比價；參與戰

後接收工作的邵毓麟則是根據京滬物價指數、中儲行庫存現金及外匯總額、大後方物價指數、法幣發行額及其對美金匯率等資料，提出一百比一的建議。此問題眾說紛紜，仍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

再者，作者對部份議題可能因史料不充分而作出錯誤的判斷，例如作者在本書第二三八頁中提到戰時曾有「日軍與中統局掛鉤向大後方偷運偽造法幣」的現象，事實上，這個問題涉及中統和軍統兩個單位的競爭，軍統的戴笠藉由中統人員蘇芝漢攜帶大批法幣赴淪陷區貿易的案子打擊中統的徐恩曾，其間經過詳細紀錄在現存台北的國防部軍務局的「蘇芝漢等漢奸案」原始檔案中，而且，當時任職侍從室的唐縱也在其日記裏留下本案對戴笠的批評。抗戰時期史料散亂不堪，收集不易，是研究工作的極大挑戰，我們不能奢望史料全面到手後才進行研究，但至少應在論述時盡量小心。此外，本書中較明顯的文字錯誤有將王業鍵誤植為王業健、將みすず書房誤植為ゐすず書房、將文海出版社在 1973 年翻印出版的《中國戰時經濟志》誤植為 1937 年。不過，均不會對本書正文的閱讀造成影響。

在這本大陸學界第一部全面觀察抗戰時期貨幣史的專著中，作者雖然無法完全擺脫意識型態指導，然而就掌握史料作學術研究的基礎觀之，作者已經跨出了一大步，若能再加強史料的分析工作，去除不必要的解釋框架與特定的意識型態，更能彰顯本書的學術價值。

林美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